

莫言钧 主编

震惊世界的 国际间谍



ZHENJING SHIJIE DE
GUOJI JIANDIE

红旗出版社

D5-6

19

D12-110

震惊世界的国际间谍

莫言钧 主编

红旗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8 号

震惊世界的国际间谍

主 编 莫言钧

责任编辑 王农媛 封面设计 王中兴

出 版 红旗出版社(北京沙滩北街2号)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

787×1092 32开 7.75印张 174千字

1993年4月北京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0册

ISBN 7-80068-484-9/Z · 156

定 价 5.40元

目 录

“第三个人”的沉默战

——哈罗德·金·菲尔比…………… (1)

道是无情亦有情

——保格丹·史塔辛斯基…………… (28)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科的“叛逃”案…… (41)

间谍与反间谍

——达斯科·波波夫…………… (76)

一个不可捉摸的幽灵

——贡萨拉斯·玛达…………… (92)

潇洒的客人

——以色列间谍大王沃尔夫冈·洛茨 … (107)

在记者身份的背后

——佐尔格的间谍生涯…………… (136)

希特勒的间谍

——海因里希·希姆莱…………… (170)

双重间谍

——富特 (213)

辛 西 娅

——改变了战争进程的间谍 (226)

后 记 (244)

“第三个人”的沉默战

——哈罗德·金·菲尔比

本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利用英国出身富有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普遍的失望情绪，成功地发展了一批重要的间谍，菲尔比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菲尔比(1912—1988)，全名哈罗德·安德里安·鲁塞尔·金·菲尔比，1912年1月1日出生在印度安巴拉。其父圣约翰·菲尔比爵士是著名的阿拉伯语言学者，曾任印度政府文官。菲尔比13岁时进入威斯敏斯特学校读书，少年时代就反抗过英国公学体制里的种种骇人的偏见。17岁时，升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那里，菲尔比加入了社会主义者学会。最初，他只参加该学会的会议，而不参加其他活动，但是在1931年工党政府下台以后，菲尔比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开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活动，并于第二年成为该学会的司库。他通过大量地阅读欧洲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接受了不少左翼主张，特别是共产主义的主张。1933年，菲尔比从剑桥大学经济系毕业时，已经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了。

大学毕业后，菲尔比骑着摩托车在欧洲大陆旅行，行至维也纳时，他结识了一位名叫丽希·弗里德曼的犹太姑娘。弗里德曼也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后来长期担任欧洲共产

国际的代理人。1934年的维也纳暴乱四起，奥地利政府命令军队炮轰工人住宅区，同社会主义者发生了流血冲突。菲尔比和弗里德曼一道帮助了部分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脱离虎口。同年2月24日，他们结了婚。因此可以推断，菲尔比是在妻子的帮助下成为苏联间谍的。5月，社会主义运动在维也纳失败后，菲尔比夫妇返回英国。

回国之后，菲尔比表面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避而不见剑桥同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以前同他在政治上有联系的朋友都断绝了来往，开始成为德国驻英大使馆的常客。1936年，菲尔比加入了亲纳粹的英德联谊会，他在剑桥时的同学盖伊·伯吉斯也是该联谊会的成员。该会还在纳粹的资助下创办了一份旨在密切英德关系的出版物，由菲尔比任主编。尽管他竭尽了全力，但这份杂志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菲尔比还多次前往柏林，在德国的宣传部和外交部同纳粹进行会谈。在柏林，他耳闻目睹了纳粹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杀戮和对共产党实行的恐怖政策。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的共产主义背景，菲尔比在1937年遗弃了弗里德曼，割断了同共产党仅有的一点公开的关系。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第二年2月，菲尔比被苏联情报机构派往西班牙法西斯占领区，表面上是采访报道佛朗哥的军队，而实际上是全面搜集有关法西斯战争准备的第一手情报。然而，1937年4月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却使菲尔比险遭不测。

到西班牙后，菲尔比还象以前那样把写有密码和秘密联系地址的纸片放在衣兜里。在塞维尔工作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忽然产生了去科尔多瓦看斗牛的想法，因此在一个星期五，菲尔比来到了科尔多瓦。当天深夜时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

他从睡梦中惊醒。门一开，两名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员就闯了进来。

“跟我们到指挥部去一趟！”他们命令道。

“可是为什么？”菲尔比问。

“这是命令！”其中一个年龄较大的下士不耐烦地吼了一声。

这时，菲尔比首先想到的是应该处理掉衣兜里的那张纸片。他心里想：要是房间里有个洗澡间就好了，可是他住的房间里偏偏没有洗澡间，看来只好另想办法了。然而那两个国民警卫队员严密地注意着菲尔比的一举一动，不给他半点机会。在去指挥部的路上，他们更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最后，菲尔比被带到一位身材矮小的国民警卫队少校面前，少校紧绷着脸，露出一副目中无人的神态。

“你的通行证呢？”

“我没有通行证。”

“那么是谁批准你来科尔多瓦的？”

“来这儿之前，我曾去塞维尔军事司令部申请办理通行证，可是一位少校先生告诉我到科尔多瓦不需要办通行证。”

“胡说八道！谁不知道来科尔多瓦要有通行证！”少校显然对菲尔比的理由不屑一顾，他接着又问道：

“你来科尔多瓦做什么？”

“看斗牛。”

“票呢？”

“还没买，不过我打算明天一早……”

“明天一早你必须离开这儿！”少校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

菲尔比观察了一下这间办公室，发现在耀眼的灯光下有一张光滑的大桌子。

少校和他手下的两个人仔仔细细地搜查了菲尔比随身携带的手提箱，但一无所获。接着，少校又命令菲尔比把口袋都翻过来。眼看就要露馅了，菲尔比急中生智，掏出钱包往那张光滑的大桌子上一扔，只见那三个人如饿虎扑食一般奔向钱包。菲尔比趁此机会把那张可以泄露天机的小纸片塞到嘴里，一眨眼的功夫就将它咽了下去。等他们转过身来，菲尔比又不慌不忙地取出口袋里剩下的东西。看到实在找不出什么可疑的东西，少校在装腔作势地对菲尔比讲了一通道理之后就放他走了，菲尔比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1937年7月，菲尔比当上了英国《泰晤士报》驻佛朗哥军队的记者。一次，菲尔比乘坐的汽车被炮弹击中，菲尔比的三个同伴当场被炸死，他本人也受了伤，但总算死里逃生，幸免于难。第二年，佛朗哥亲自授予他红十字勋章。

西班牙内战期间，不少菲尔比以前的左翼同志都作为“国际纵队”的成员战斗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他们对菲尔比所采取的立场都感到深恶痛绝。其实，菲尔比的献身精神并不比他们逊色。因此，他对自己蒙受这种“不白之冤”感到十分委屈。例如，一位菲尔比以前的朋友曾对他的转变表示遗憾，几天后，菲尔比就让弗里德曼转告这位朋友：“请不要被现象所迷惑，我完全是以前的我。”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几乎每一个人都被菲尔比所指的“现象”迷惑住了。

1939年7月，菲尔比离开西班牙前往法国，任《泰晤士报》驻法国阿拉斯英军总部的记者。在法国做了将近一年的战地记者之后，1940年6月，即敦刻尔克大撤退前夕，菲尔比又回到了伦敦，这时，他已经决定离开《泰晤士报》了。在朋友的安排下，他同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一位领导面谈了一次，

但未被录用。不久,《泰晤士报》的一位编辑告诉他,国防部的谢里登上尉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做些与国防有关的工作。虽然菲尔比不认识谢里登上尉其人,但他还是立即答复了对方的询问。后来,菲尔比在老同学盖伊·伯吉斯的帮助下,在英国秘密情报局(亦称军事情报第六局)的D科(破坏活动科)谋到了一个职位。在此半年前,叛逃到英国的苏联间谍克里维茨基曾警告过英国当局:有一个年轻的英国记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被派去为俄国人搜集情报。菲尔比受到了例行公事的审查,但审查结果却是“查无实据”,因此他得以蒙混过关。

1940年7月,菲尔比被派到布里肯登伯里大厦的特工学校工作,但是没过多久,这次训练情报人员的尝试就以失败而告终。该校解散后,菲尔比又被调到刚成立不久的特别行动执行处,成为汉普郡博略的一所训练颠覆和破坏活动人员的特工学校的教官,后来,他在教学中故意出错,并以此为借口从该校辞职。

1941年9月,菲尔比正式从特别行动执行处调到秘密情报局第五科。该科名义上只是一个负责反间谍活动的通报科,但事实上它有权利用非法手段在国外搜集反谍报方面的情报,而对这类情报感兴趣的部门主要是军事情报第五局,这是一个负责英国本土安全、需要尽可能提前详细了解外国刺探英国机密情况的情报机构。当时负责第五科的是费利克斯·考吉尔少校,他在职责范围这个问题上与军情五局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军情五局认为它有权掌握第五科所获得的一切情报,而考吉尔则认为军情五局只有权掌握与英国本土安全有直接关系的情报。因此,这两个机构常常因为权限问题而争执不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双方才建立

起比较合理的联系。在双方的争论中，菲尔比往往是站在同情军情五局的立场上。

菲尔比负责第五科的伊比利亚组，主管英国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情报工作。在这一时期，他经常跟秘密情报局档案中心的负责人比尔·伍德菲尔德在一起饮酒聊天。菲尔比利用这种关系接触到大量的有关情报来源的档案卷宗，里面有关于秘密情报局海外间谍的详细情况的档案。他不仅研究了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档案，而且还仔细阅读了有关苏联的情报来源的档案材料。可是不久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一天，比尔打电话给菲尔比索要有关苏联情报来源的第二部档案，菲尔比告诉他已经还过了。比尔又在档案中心找了一遍，仍然一无所获，回过头来又催菲尔比再查找一遍，菲尔比把整个办公室都翻遍了，可是连档案的影子都没见到。按照规定，比尔应立即将此事上报，但是，在菲尔比的苦苦劝说下，他答应再宽限几天。菲尔比最清楚：阅读这种档案就已经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现在又丢失一卷，如果让头头知道了，肯定饶不了他。菲尔比越想越害怕。但是时隔不久，比尔又打来电话向菲尔比赔礼道歉。原来，比尔的一位秘书为了节省空间，把两部卷宗订在一起了。菲尔比虚惊一场，但还是愉快地接受了比尔的道歉，二人又和好如初，并约定当晚就一起去喝他们最爱喝的红色杜松子酒。

1942年下半年，同盟国进攻北非的计划原则上已经确定下来。第五科的任务是及时向英军参谋部提供情报。考吉尔抓住这一时机，极力主张应派遣一个由第五科的人员组成的特别反谍报小组进驻参谋部，这一建议被采纳了。菲尔比本人也希望能接近战争，因为这样，他的职权范围就有可能随

着盟军的节节胜利而逐步扩大。因此，当考吉尔问他是否愿意负责北非地区的情报工作时，他立即表示乐于从命。1942—1943年间，菲尔比的职权范围先是扩大到北非，后来又扩大到意大利。菲尔比回伦敦后，正赶上考吉尔出访美国，在此期间，第五科的一切情报工作都由菲尔比代理负责，他在情报机关中地位已经开始步步上升了。

1943年，在第五科科部的驻址问题上，菲尔比私下采取了反对考吉尔的态度。生性多疑的考吉尔生怕自己在第五科的大权受到威胁，因而坚持第五科继续留在圣奥尔本斯而不迁往伦敦。而军情五局则要求第五科尽快迁往伦敦以便同它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菲尔比同军情五局的意见一致，他认为离军情五局和政府其他部门愈近，就愈能更好了解各种情报。因此，当考吉尔过于自信地宣布将通过自由表决的方式来解决搬迁问题时，菲尔比抓住大多数人都厌倦与世隔绝的军营生活的心理，不辞劳苦地做了大量地游说工作。最后，表决的结果表明有三分之二的人赞成搬回伦敦。不久，第五科就从圣奥尔本斯迁往伦敦的赖德大街。

1943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美国人仍然对反谍报工作一无所知，因此，他们选派了一批人到伦敦英美反情报联合行动总部向英国人学习，一位叫安姆斯·杰塞斯·安格尔顿的学员后来成为美国情报界的风云人物。菲尔比是他们的教官。安格尔顿和他的反间谍艺术的启蒙老师菲尔比一见如故，并在以后的生涯中成为至交。他们一个是美国著名的反谍报专家，一个是苏联克格勃打入英国情报机构内部的高级间谍，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竟成莫逆之交，堪称谍报史上的一大笑话。

在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之前，秘密情报局看到同盟

国稳操胜券的大局已定，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另一个对手——苏联，建立了一个新的反苏反共的科室——第九科。一位快要退休的军情五局的官员被调来任这个科的科长，但是此人年事已高，耳背而且还不熟悉秘密情报局的工作方法，因此，人们都清楚：他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角色，不久就会被秘密情报局的官员取而代之。菲尔比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秘密情报局将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方面的情报上，因此不可能出现第五科、第九科（都是反间谍科）同时并存的现象，最后很可能是把它们合二为一。如果论资排位，那么合并后的负责人的位置肯定是非考吉尔莫属。第九科成立之后，菲尔比的苏联指挥者要他尽一切努力成为第九科的科长。而菲尔比要想成功，就必须踢开考吉尔。在这场权位之争中，菲尔比把自己作为一名高级间谍所具有的各种素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考吉尔一向是疑神疑鬼、自命不凡的。为了使自己在小小的情报“王国”里的地位不受威胁，他不惜跟军情五局和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们多次发生正面冲突，因而树敌甚多。要搞掉考吉尔，菲尔比自然会考虑到同他的对手结盟。但与此同时，菲尔比的心情也十分矛盾，他曾经是考吉尔最亲近的幕僚之一，而且自己也承认他非常尊敬考吉尔，并且在很多事情上还十分感激他，但是为了事业，菲尔比又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击败他。

菲尔比首先考虑的结盟对象是秘密情报局副局长瓦伦丁·维维安。早在菲尔比的父亲圣约翰·菲尔比在印度任行政文官时，维维安就已经和他成为至交了，维维安曾说过他非常了解菲尔比一家人。菲尔比就是在维维安的帮助下从特别行动执行处调到秘密情报局的。维维安还善于思考问题，菲

尔比从他那里了解到不少关于秘密情报局的历史、发展、人员的更换以及它与军情五局的关系等方面的情况。

但维维安生性软弱，例如，他虽然是考吉尔的顶头上司，却对考吉尔惧怕三分。考吉尔从来不把这个副局长放在眼里，总是把他撇在一边，直接跟局长斯图亚特·孟席斯联系。维维安对考吉尔更是痛心疾首、恨之入骨。他曾经有几次在菲尔比面前委屈地哭泣，并问菲尔比：

“金，你说我该对考吉尔怎么办？”

“我本人也没有什么高见，不过我认为您最好还是去问一问阿诺德·福斯特，如果能让他跟盖伊·利德尔见见面，问题或许就能解决。”菲尔比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阿诺德·福斯特乃是局长孟席斯任命的秘密情报局的首席参谋，也是局长的耳目，他的话局长不可能不听。盖伊·利德尔则是军情五局的第二号人物，他长期在五局任职，一向是铁面无私、直言不讳，被视为军情五局的灵魂。而考吉尔刚愎自用的做法引起军情五局的大多数官员强烈的不满，他们甚至对考吉尔怀有深深的敌意。如果能安排阿诺德·福斯特和利德尔面谈一次，军情五局对考吉尔的不满很快就会传到局长的耳朵里去。

心有灵犀一点通，维维安当即表示要按菲尔比所说的去做。果然，等菲尔比再次见到维维安的时候，对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兴冲冲地告诉他：“那件事真让阿诺德·福斯特大吃一惊！”

不久，阿诺德·福斯特就打电话要菲尔比去跟他面谈一次。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谈论秘密情报局的现状和未来、在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该机构需要改进的地方以及改进的程度。他们彼此心照不宣，谁也没有提及考吉尔。菲尔比意识

到阿诺德·福斯特是在考验他，因此也尽量显得心底无私、襟怀坦白。

后来，菲尔比彻底击败考吉尔的天赐良机终于到来了。一次，维维安让菲尔比看一份由考吉尔起草的信稿，信中充满了猛烈抨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言辞。当时外交部驻秘密情报局的首席顾问帕特里克·赖利对信稿极为不满，他批示道：“第五科起草的这份信稿根本不符合要求。如果发出会造成严重后果，它会让秘密情报局闹笑话，会引起两个单位负责人的争吵，甚至会使英美关系受到影响。”赖利让维维安重写一份，而维维安又委托菲尔比替他起草。菲尔比很快就写了一封半页长的信，只委婉地提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维维安粗粗地看了一遍就把信交了上去。

维维安还向局长递交了一份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张：在和平时期不能再容忍第五科把它同其他部门的关系继续搞得僵。他强调必须彻底改变第五科的现状。在谈了第九科的情况之后，维维安还详细列举了菲尔比的种种优点，并推荐菲尔比做下一任第九科科长。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菲尔比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军情五局能以官方的身份参与我的任命，那么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在提拔菲尔比之前，秘密情报局局长还专门召见了。局长给菲尔比看了维维安的报告，并说他马上就要任命菲尔比为第九科的新科长。在被问及他本人对这项任命有何看法时，菲尔比郑重其事地说他希望在上任以后能够避免象考吉尔那样同天天打交道的军情五局发生不必要的磨擦。如果军情五局能够对他的任命正式认可，那么他工作起来将会更有信心。孟席斯对菲尔比的话表示赞许，并答应他将尽快把这一任命告知军情五局局长戴维·皮特里。令菲尔比感到

幸运的是，皮特里很快就作出了友好的答复。

1944年，菲尔比被正式任命为第九科科长。消息刚一传开，正如菲尔比所期望的那样，腹背受敌、心胸狭窄的考吉尔一气之下就辞职不干了。此后不到一年，菲尔比又设法使第五科和第九科合并了，并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合并后的负责人。

毋庸置疑，菲尔比是一位精明的心理学家。他依靠自己惊人的判断力、工作能力和灵活的头脑，不仅赢得了秘密情报局领导集团的赏识和信赖，而且还对军情五局的头头们的性格特点都了如指掌。众所周知，几乎每一个秘密机构内部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相互倾轧现象，秘密情报局也不例外，而菲尔比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争夺中巧妙地利用官僚们为自己谋私利的心理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然而，间谍的生涯并不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而是时时面临着惊涛骇浪的考验。例如，伏尔科夫案件就曾一度严重威胁着菲尔比的地位。1945年8月的一个早晨，秘密情报局局长孟席斯把菲尔比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让他看一份关于苏联间谍康斯坦丁·伏尔科夫打算叛逃到英国的报告。伏尔科夫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但他实际上却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高级情报官员。他告诉英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佩奇，如果他提出的要求（2万7千英镑的酬金和允许政治避难）能够得到满足，他愿意提供有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以及苏联在国外的间谍活动的情况，他还准备揭露苏联在英国政府内部的两名间谍，其中有两名在外交部，另外一名在反情报机构。伏尔科夫要求三周内得到答复，并告诫英国总领事馆千万不要

用电报的形式进行有关这些情报的通讯联系，因为苏联人已经成功地截获并破译了英国的一些电报通讯密码，因此，他建议使用外交邮袋。但是等到这份材料到达秘密情报局时，已经过去十天了。菲尔比或许知道外交部的那两名间谍是谁，至于那位反情报官员是何许人，菲尔比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伏尔科夫人头落地，就是那三名间谍原形毕露。菲尔比长时间地盯着那份足以使他不寒而栗的报告，心里琢磨着对策。最后，他告诉局长他需要深入研究一下案情，然后才能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局长同意了，并要求菲尔比本人专门管理这份材料。

菲尔比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第二天就向局长汇报了他个人的意见：既然伏尔科夫坚持不要使用电报联系，而用外交邮袋联系又十分缓慢，不利于把握案情的发展，因此需要派一个了解全部案情的人去伊斯坦布尔进行现场办案。行动的本身很简单，只需把伏尔科夫先安置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将他转移到埃及的英国占领区进行审问就行了。菲尔比的目的是亲自去伊斯坦布尔，表面上是帮助伏尔科夫叛逃，而实际上是赢得时间以便及时向苏联人发出警告。但是，他没想到局长想让负责中东地区保安情报事务的军情五局官员罗伯茨前去办理此案，因此而感到非常失望。但是不久，他却惊喜地发现：罗伯茨天生怕坐飞机，而且他回国的假期将满，已经安排好下周乘船回开罗，孟席斯试图让他改变计划，但没有成功。菲尔比趁机向局长毛遂自荐，说自己愿意代替罗伯茨前往伊斯坦布尔，孟席斯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从开始办理出境手续到菲尔比登上飞机，又用了三天的时间。飞机取道开罗飞往伊斯坦布尔，途中又遇上了雷暴雨，被迫改变航向在突尼斯降落，因此，飞机抵达